

《山祭》与现代神话剧

吴保和

《上海戏剧》1985 年第 3 期

—

《山祭》不是孤零零的一部剧作，它是一个整体构思中的一部分，是一个剧本系列中的第一个作品，这个剧本系列，我们称之为“现代神话剧”我们意欲在自己的戏剧创作中，采用人们所热知的古代神话故事，加以重新解释、改造。使这些古老的神话在我们的剧本呈现中出另一种面貌，展示其新的含义，借以表达我们对历史的反思，对观实的认识和对未来的探索。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不仅有许多古人所创造出来的，为人们所熟悉神话人物，神话故事和情节，还连带着充满了古人所创造出来而为人们所接受了的一整套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

式。这些形象和观念已经成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深深地进入了我们的意识之中。今天，当我们面临着中国摆脱自己沉重的过去和历史的重担而进入现代化的时刻，有许多为人们所熟悉的东西必然要发生变化，这中间也包含着观念上的变化。可以想象的是，当我们带着为我们所接受了当代科学思想和许多新观念，以一个头脑清醒的现代人的眼光，逐一审视我们丰富的古代神话时，我们惊讶地发现了其中有许多过时的观念。这个发现使我们激动，使我们思索，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创作的欲望。我们觉得，正如历史学家需要对过去的历史重新评价，科学家需要对过去的原理不断纠正一样，艺术家也需要对过去的形象加以改变和重新塑造。在新的观念的指导下，运用丰富的艺术想象和大胆的艺术处理去重组神话的结构，对人们熟悉的神话人物和神话故事加以改造，使其产生不同于以往的新面貌，对人们已经习惯的观念提出挑战，使观众对他们熟悉的东西产生陌生感和新鲜感，对他们已经接受的观念发生怀疑，这就是我们创作现代神话剧的意图和方法。

愚公，是一个人们相当熟悉的神话人物，愚公精神是人们常常使用的一个字眼。然而，什么是愚公精神，移山究竟包含了一种什么意义，我们却听到了两种不同的见解。有人说，愚公精神是愚蠢的，移山代表了一种唯意志的盲目

行为；也有人说，愚公精神是伟大的，移山代表了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自古以来，愚公移山就是一种伟大意志的象征，不能把我们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愚蠢行为归于愚公精神。当然，把我们生活中发生过的愚蠢行为归于愚公精神是不必要的。但是，愚公精神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作为剧作者，我们却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愚公精神是愚蠢的吗？然而，这种愚蠢的精神何以会延续二千多年，并对我们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形成、发展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难道这表明了我们的二千年来是以一种愚蠢作为民族意志的象征吗？愚公精神是伟大的吗？那么，又何以解释这样一种伟大的精神竟会为那么多愚蠢的行为提供精神力量呢？难道能促使人们去干蠢事的精神是伟大的吗？这样一堆难以回答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迫使我们不得不去寻找回答，去进行更深一层的思索。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我们觉得在于山，而山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古人所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的。在后来的神话故事里，愚公是这样回答智叟的规劝的，我虽然会死，但还有儿子在，儿子又生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儿子又有儿子，儿子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而山并不增加，有什么平不了的呢？以不断延续的人对不会增高的山，愚公的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可以使智叟无以应答的。这里，愚公和智叟同答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他们都是从人这一角度看问题，都相信山是不会增高的。然而，在掌握了科学知识的现代人来看，愚公的回答却是有懈可击的。倘若现代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由于处在造山运动中，因而山本身也在不断增高，其增高的速度甚至大于挖去的速度，那么，愚公又将如何回答呢？如果愚公还坚持原来的回答；那么在现代人看来他就是愚昧的，固执的。因此，对于愚公精神究竟是伟大还是愚蠢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应该从两个角度来看，从愚公的角度看，山是不动的，人是延续的，因而移山的行为是有意义的，愚公精神是伟大的；从山的角度看，人是延续的，但山也是增高的，因而移山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愚公精神是愚蠢的。但是，问题并没有结束，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变化和运动中，如果有一天山的增高终于停止了，那愚公精神还是伟大的，但是，如果山的增高一直继续下去，那愚公精神依然是愚蠢的。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愚公这个人物，看待挖山这件事情，我们既不能完全接受愚公精神是伟大的这种传统观念，又不能

完全接受愚公精神是愚蠢的这种极端说法。我们觉得，愚公精神既不是单纯伟大，又不是单纯愚蠢，它是伟大与愚蠢的混合，是我们民族性格中某些优点与某些缺点的混台，这种认识促使我们去写一个复杂的愚公，他坚定但又近乎残酷；他伟大但又有些愚蠢，他的内心并不象一般人所认为的那么简单，而是充满复杂的矛盾，当然，这样的愚公不是古人的愚公，不是神话中的愚公，但确是我们眼中的愚公，是经过我们思索的愚公。

有人认为，《山祭》是讽刺某一件事，影射某一个人。这是大大地误解了我们的创作意图的，讽刺某一件事，那么，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影射某一个人，一个人又能活多长时间呢？不，我们所思索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某一件具体的事，我们思索的要更多一些，更广一些。在人类历史上，充满了人类以无与伦比的伟大精神对自然作斗争的例子。但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人类在自己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上不可能完全了解自然，了解他所面对的对象，因此，当人类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坚持到底的决心去完成一件他并不十分了解的事，当人们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的代价而最终发现这些努力全部或大部变得毫无意义时，当一些人抱着坚定的信仰，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去做他认为应当做的事情时，他们的行为便具有了极大的悲剧性，而愚公移山的神话正是以隐喻的方式表现了人类的这个基本情境。可以说，在这一方面，和希腊神话中的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一样，愚公精神的悲剧性也就是人类某种悲剧性的具体化。愚公移山这样的情境，在人类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可能产生，愚公的悲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有可能发生，这样，愚公精神的悲剧性便有了普遍的意义，而这，正是我们在剧中惜愚公形象所要思索和探讨的问题。

当然，由于我们刚刚经历过一场灾难，许多人对曾经发生过的许多愚蠢行为记忆犹新，因而对《山祭》产生了这样那样的联想，这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的，在这方面，我们并不苛求观众放弃他们的联想，我们只是希望人们在产生联想的同时，也能理理解我们创作的苦心。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具有万千形象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各种矛盾的世界，一个复杂到一个人尽其毕生之力也无法完全弄清其意义的世界。要想稍微全面地认识和把握这个世界，一个剧本的篇幅是远远不够的。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

是一群追求新思想新艺术的青年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探索，共同的艺术主张使我们缩短了各自的距离，进入一个共同的题材领域，但不同的个性，气质，追求又使我们在具体的创作中分离出来，选择各自有兴趣的题材去研究，想象，创作。这样，我们既能分以体现各自的探索；又能合以构成共同的追求。因而，对我们来说，现代神话剧必定是一组剧作，而不是一个单独的剧本。我们之所以能有分有合，还因为中国神话本身，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比起希腊神话来，中国神话虽然没有那么完整的体系，但有着同样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大量可用的素材。此外，现代科学的各种新思想、新理论也给了我们有益的启发，引导我们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把系统论引入艺术创作的领竣。我们认为，既然世界是一个大系统，我们就应该不仅从一个点，而且也应该以系统的方式来认识和把握世界。不仅以一个剧本，而且以一个剧本系统来表达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因此我们在创作中，应当努力使自己的思维带有系统思维的特点，使创作出来的神话剧系列能自成一个小系统，并且能与外部世界保持某种同构对应关系。这样，一方面，系列中的每个剧本以其自身来反映世界，另一方面，所有的剧本都作为要素，共同构成一个剧本系统，这样，由于系统特性的作用，不仅每一个剧本，就是剧本之间，也就是系统本身，也能反映世界。于是，就能使神话剧系列由于系统大于各要素总和的原理而产生新质，起到比一个一个单独的剧本更大的作用。

我们对于现代神话剧没有统一的模式，只有大致的约定。我们想象中的现代神话剧应该是丰富而有趣的。对于主题，我们没有严格的规定，而是根据剧作者不同的个性、气质，根据题材本身的特点和可能，随意地加以表达，但我们有一点共同的想珐，想把主题搞得尽可能广一些，深一些。不局限于暂时的需要，而具有一种历史和哲学的深度，不对某些一瞬而过的社会问题发表见解，而对人所面临的一些根本问题加以思索。对于剧作形式，我们更想以自由的探索态度作多方面的尝试，不管是传统的场幕结构，还是现代的不分场幕的结构，不管是叙事的形式还是非叙事的形式，统统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为了使现代人的视角在剧中更加突出，我们设想将在每一个现代冲话剧里都放进现代人的形象，当然，这种形象可以以多种方式出现。

我们的实践刚刚开始，我们的剧作尚不成熟，我们的观点也有待讨论，但我们愿以自己的想法与社会对话，与同时代人对话，我们知道，漫长的探索在等待着我们，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也如同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一样，是充满荆棘而不是布满鲜花的，但是，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作为一种艺术的探索，我们是不会停止自己的脚步的。

最后说明的一点是，这篇文章虽然出自一个人的手笔，却是一群人的艺术主张。

原载《上海戏剧》1985年第3期

厦门大学图书馆